

华蘅芳

华蘅芳，中国清末数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字若汀，生于道光十三年，卒于光绪二十八年。江苏常州金匱（今无锡市）人。出生于世宦门第。少年时酷爱数学，遍览当时的各种数学书籍。青年时游学上海，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交往，李氏向他推荐西方的代数学和微积分。1861 年为曾国藩擢用，和同乡好友徐寿（字雪村）一同到安庆的军械所，绘制机械图并造出中国最早的轮船“黄鹄”号。他曾三次被奏保举，受到洋务派器重，一生与洋务运动关系密切，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之一。

字若汀，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 年），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人。受擅长数学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热爱数学。10 岁开始，常读中国古代算经。至 20 岁，已学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测圆海镜》以及明清以来的数学著作。以后又从上海墨海书馆买回一批西方近代数学著作，悉心钻研。这时，他结识了同乡徐寿，两人志同道合，过从甚密。通过实验，他们掌握了近代数学的一些原理及其运用方法。

华蘅芳，机械工程专家、数学家。中国早期掌握和传播近代科技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徐寿等人试制成中国第一艘实用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主持制成硝酸和氢气球。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方术、积较术、数根术等方面的成就，翻译了多种近代科技书籍，较早地将近代矿物学、生物进化论、概率论等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科技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1833 年出生于江苏金匱（今无锡）南延乡荡口。其父华翼纶为举人，官至四品。华蘅芳自幼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却对算学入迷。其父为他买回了一些古算书，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数学。他还与同县的徐寿（1811~1884）互相造访，商讨学问，结为至交。他俩曾去上海墨海书馆拜访翻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的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并结识了容闳（1828~1912）和外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 Wylie, 1815~1887）、傅兰雅（J. Fryer, 1839~1928）等人，开阔了眼界。华蘅芳不仅钻研书本，而且还重视实证和动手实践，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十分可贵的。他和徐寿曾在家乡将水晶印章磨成三棱镜作白光的分色实验，还测试过枪弹弹道的抛物线。

1861 年秋，两江总督曾国藩筹办安庆军械所。于 1862 年初华蘅芳和徐寿应曾国藩的邀请前往，专办制造事宜。1865 年，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调华蘅芳、徐寿前往“建筑工厂，安置机器”。1867 年，华蘅芳、徐寿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翌年制造局内设翻译馆。从此，华蘅芳把主要精力用于译书，同时进行数学等方面的研究。1876 年格致书院成立后，他前往执教 10 余年，并参加院务管理工作。1887 年他到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习。1892 年到武昌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讲授数学。1896 年回到江南制造局的工艺学堂，任数学教习。1898 年回到家乡，在无锡谿实学堂

任教。1902 年逝世。他毕生致力于研究、著述、译书、授徒，工作勤奋，敝衣粗食，淡泊名利，不涉宦途，在科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咸丰九年（1859 年）秋，华蘅芳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数学著作《抛物线说》。徐寿为之作图。咸丰十一年，华蘅芳和徐寿受曾国藩推荐入其幕府。同治元年（1862 年）三月，与徐寿一起到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从事机动船的研制。他们经过周密的计算和设计，用 3 个月时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接着又于同治四年设计制成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命名“黄鹄”号。同年，他到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参加筹建工作。

同治六年，徐寿次子建寅受曾国藩派遣，亦来到上海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华蘅芳协助徐寿主持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与美国友人玛高温合译（玛作口译，由其笔述）出版了有关矿物学的译著《金石识别》。他又协助徐寿在制造局内创设翻译馆。同治十一年，他写出《开方别术》一书，被当时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推为杰作。此后，他与玛高温、傅兰雅先后合译了《地学浅释》、《防海新论》《御风要术》等书，于同治十二年相继出版。是年，他和徐寿、徐建寅并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提调。同治十三年，与英人傅兰雅又先后合译《代数术》、《微积溯源》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版。光绪二年（1876 年），华蘅芳助徐寿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开学，他主讲数学。与傅兰雅合作，又先后译出《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决疑数学》等，还编写出版了《开方古义》、《算法须知》、《数根术解》、《积较术》、《学算笔谈》等著作。光绪十三年，华蘅芳主讲天津武备学堂。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测量法》，并与傅兰雅合译了《合数术》等书。光绪十八年，他主讲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写出《求乘法法》、《数根演古》、《循环小数考》、《算学琐语》等著作。

光绪十三年（1887）他曾在天津武备学堂中任教习，光绪二十二年，先后担任常州龙城书院和江阴南箐书院院长。晚年在家乡俟实学堂讲学。他讲授时，深入浅出，启发诱导，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当时中国制造火药，需要大量硝镪水原料，国内不能生产，只得依赖进口。但是欧美国家乘人之危抬高价格。华蘅芳得知此事，十分气愤，表示要“自制镪水以塞漏卮”。他经过反复研究、实验，终于在龙华火药厂研制成功，所需成本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打破了列强的垄断。

他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时，学堂因教学需要，从德国引进了一部“试弹速率机”，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性能及使用方法。华蘅芳运用他在数学领域的丰富知识，向大家一一讲清了这部机器的道理和使用方法。人们对他由衷地敬佩，并为中国有这样的学者而自豪。

华蘅芳官至四品，但非从政。他不慕荣利，穷约终身，坚持了科学、教育的道路，与李善兰、徐寿齐名，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先行者。他一生“敝衣粗食，穷极终身”，“未尝求禄仕进”，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自然科学事业，为我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最后将

一些有创见的著作，合刻为《行素轩算稿》一书。光绪二十八年逝世，终年 69 岁。作为近代中国的卓越的数学家、爱国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和业绩永留青史。

在武备学堂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德国军事教官，拿来一个中法战争中法国使用的行军瞭望气球（已坏）进行讲解。他说，这个气球，在我们德国一百年前就有了，而在你们中国，现在大家还没有见过，你们既不会使用，更不要说制造。华蘅芳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决心要造出一个，让德国人看看。他立即着手进行设计，并亲自督工试制，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厂。终于在 1887 年制成了一个直径为 5 尺的氢气球。当这个中国人研制的气球冉冉升空时，人们欢欣鼓舞，感到扬眉吐气。华蘅芳为中国争了光。

1880 年（光绪六年），由华蘅芳与来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 Fryer. 1839--1928 年）合作译出《决疑数学》一书，首次把西方概率论著作传入我国。该书原著者是英国人加罗威（T. Galloway）和安德生（R. E. Anderson）。

关于“Probability”这个词，华蘅芳译为“决疑”，后来又有人译为“或然率”、“可能率”、“适遇”、“机率”等。1964 年。《数学名词》（补编）统一确定用“概率”。

华蘅芳潜心编译这部书，是由于他当时已认识到概率论在研究社会现象中的地位与作用，迫切期望中国人尽快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他在书的卷首“总引”里提到：“概率论的应用广泛，能用于国家治民，或民自治，或兴起风俗，改定章程”；可“代替占卜”，估测人口，指导人寿保险，预求判案准确率以及统计邮政、医疗事业中某些平均数等。

《决疑数字》的内容是系统而完整的。在“总引”中，除强调概率论的应用外，还简要介绍概率论发展的历史，以及有成就的 30 多位数学家的作品。前五卷是古典概率，列有许多有趣的历史名题，如点数问题、投针问题、分赌本问题、彼得堡赌法等。第六、七卷讲的是概率论应用于人寿保险、判案准确率的计算等。后三卷包括大数定律、正态分布、最小二乘法：斯特林（J. Stirling）公式。有的计算题要用到二重积分、无穷积分。就其深度，大致与现代工科大学学生学习的內容相当。

《决疑数学》译出后，没有及时刊刻，这是由于译者感到此书新颖而艰深，时难以为读者接受而搁了下来。直到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才首次刊刻发行。翌年，又有铅印本面世。1909 年（宣统元年），经数学家周达（美权）校勘印行，使此书得以流传开来，成为当时学习和研究概率论的唯一读物，对概率论在我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今天，概率论在我国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用概率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硕果累累。我们自然不会忘记百余年前把概率论引入我国的之驱--华蘅芳的开创之功。

约在 1857 年，华蘅芳和徐寿在上海研读了合信（B. Hobson, 1816—1873）于 1855 年写的《博物新编》，对蒸汽机有了初步的了解。1862 年，他和徐寿、吴嘉廉、龚芸棠、徐建

寅等人在安庆内军械所试制轮船。他们以《博物新编》中的图文等为主要参考资料，由华蘅芳负责“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负责“造器置机”、制造小样。开始时，他们也曾到外国轮船上观察，“心中已得梗概”。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制成一台缸径1.7英寸（43毫米）每分钟240转的小蒸汽机，“甚为得法”。于是，着手设计制造轮船。1863年制出螺旋桨推进的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865年3月终于在南京试制成木质 徐寿和华蘅芳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处

明轮轮船，曾国藩“勘验得实”后，将其命名为“黄鹄”号。该船长55尺，重25吨，时速20余里，蒸汽机为单缸，缸径1尺，缸长2尺，回转轴、锅炉和烟囱的钢铁是进口的。华蘅芳对舶来的技术产品并不迷信。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厂，为配制火药每年需花费大量白银进口“镪水”（即硝酸）。华蘅芳决心自制“镪水”，经多次试验，终于主持制成了合格的产品，成本仅为进口价的1/3。在天津武备学堂时，中国驻德国人员购回一台新式试弹速率机，但不知如何使用。华蘅芳运用自己的数理知识分析它的原理，帮助人们掌握了它的用法。天津武备学堂准备仿制一种中法战争时所用的行军瞭望气球，以供学员演试。德国教习不相信中国人能演放和仿制。华蘅芳对外国人的讥笑非常气愤，亲自主持试制，终于在1887年仿制成了直径5尺的氢气球并试飞成功。

华蘅芳的数学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他的著作《行素轩算稿》，出版于1882年。1897年再版本共收入6种书27卷。在《开方别术》等著作中，他提出求整系数高次方程的整数根的新方法——“数根开方法”，李善兰评价此法“较旧法简易十倍”。在《积较术》等著作中，他讨论招差法在代数整多项式研究和垛积术中所起的作用，其中的“诸乘方正元积较表”和“和较还原表”在组合数学和差分理论中都有一定的意义。在《数根术解》等著作中，他讨论了“筛法”，还用诸乘尖堆法证明了费马素数定理与欧拉证法相似。他的数学成就倍受当时数学界的赞誉。他的《学算笔谈》一书论述了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学习数学的方法。这部独具特色的书在19世纪90年代再版多次，被许多学堂和书院当作数学教材，以致“东南学子，几乎家有其书”。

华蘅芳与外国人合译出版了12种171卷近代科技著作，内容泛及数学、地质学、矿物学、航海、气象、天文学等。比起他的数学研究工作，他译书的成就更大、影响更广。他与玛高温（D. J. MacGowan）于1869年合译出《金石识别》，将近代矿物学和晶体物理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这部书的原版是美国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代那（J. D. Dana）的《矿物学手册》（Manual of Mineralogy, 1848）。此后，华蘅芳与玛高温又合作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 Lyell）的《地质学纲要》（Elements of Geology）译为《地学浅释》，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赖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与傅兰雅合译了多种数学著作，介绍了

代数学、三角学、微积分等，其中《决疑数学》是中国第一部概率论译著。华蘅芳追求译著文义“明白晓畅，不失原书之真意”，后人称赞他的译著“足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华蘅芳等人的译著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蘅芳同外国学者合作翻译的书籍一类属于矿物、地质、气象和军事工程等，一类是数学。他同英国人傅兰雅共译出《代数术》25卷（1872），《微积溯源》8卷（1874），《三角数理》12卷（1877），《代数难题解法》16卷（1879），《决疑数学》10卷（1880），《合数术》11卷（1887），《算式解法》14卷（1899）等。

《代数术》与《微积溯源》是继李善兰同伟烈亚力合译《代数学》与《代微积拾级》（1859）之后的两部重要著作，特别是《决疑数学》是中国编译的第一部概率论著作，表明当时译者已认识到概率论作为数学工具在研究社会某些问题中的作用。华蘅芳译作文字明白晓畅，内容丰富多彩，使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得以进一步传播。他还介绍了西方数学家和数学史。他是李善兰之后引进西算影响最大的人。

华蘅芳的数学著作有：《开方别术》1卷（1872），《数根术解》1卷，《开方古义》2卷（1880），《积较术》3卷，《学算笔谈》6卷（后续6卷），《算草丛存》4卷（后续4卷）。以上六种收入文集《行素轩算稿》（1882）中。此外，还有启蒙读物《算法须知》、《西算初阶》等。他的研究侧重于传统数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开方术为解整系数高次方程。数根术为初等数论中素数理论及应用。积较术即招差术，为有限差分法。他的研究总的说来受到当时中算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成就主要在早期离散数学方面，《积较术》可以看作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第二、三卷创造“诸乘方正元积较表”和“积较还原表”，是两种相关的计数函数，可以与第一、二种斯特数建立函数关系；书中并给出两组互反公式，属于广义麦比乌斯反演；另外他的研究还涉及若干组合恒等式以及有重复组合的母函数定理等，这些都属于计数理论的范围，在组合数学、差分学中有一定意义，推进了中国早期组合数学的发展。

华蘅芳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担任提调，光绪二年（1876）在上海格致书院担任教习。他在晚年转向教育界，从事著述和教学。他对数、理、化、工、医、地以及音乐等学科有广博的学识，并注重科学研究。他编写了深入浅出的数学讲义和读本，以专著《学算笔谈》进行数学评论，对于培养人才和普及科学殊多贡献，成为有声望的一代学者。光绪十三年（1887）他曾在天津武备学堂中任教习，光绪十八年（1892）在湖北武昌主讲两湖书院。他的学生江衡、杨兆璽等以及胞弟华世芳（字若溪，1854~1905）受到他的影响都成为数学家。

华蘅芳的治学精神反对历来算家喜“炫其所长而匿其所短”、只讲算法而“秘匿”算理的风气；他注重数学教育，曾说“吾果如春蚕，死而足愿矣”，把发展数学的希望寄托于后

学；在数学评论中阐明了他的数学教学思想，像“观书者不可反为书所役”等精辟见解，表明他的方法论中已具有辩证的内容；华蘅芳的哲学观点散见于著述之中，兼有唯心、唯物的成分，尚未形成思想体系。

李绅

李绅（772—846）汉族，唐朝亳州谯县（今亳州人），字公垂。27岁考中进士，补国子助教。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他一生最闪光的部分在于诗歌，他是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佚。著有《悯农》诗两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千古传诵。《全唐诗》存其诗四卷。

《悯农》所属朝代：唐代；

所属文学时期：隋唐五代文学；

同时期作家：元稹、白居易；

李绅（772—846）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祖籍安徽亳州。父李晤，历任金坛、乌程（今浙江吴兴）、晋陵（今常州）等县令，携家来无锡，定居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李绅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15岁时读书于惠山。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2首，内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被誉为悯农诗人。贞元二十年（804）李绅再次赴京应试，未中，寓居元稹处。曾为元稹《莺莺传》命题，作《莺莺歌》，相得益彰，流传后世。元和元年（806）中进士，补国子监助教。后离京至金陵，入节度使李琦幕府。因不满李琦谋叛而下狱。李琦被杀后获释，回无锡惠山寺读书。元和四年赴长安任校书郎，与元稹、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诗体（史称新乐府运动），作有《乐府新题》20首。元和十四年升为右拾遗。元和十五年任翰林学士，卷入朋党之争，为李（德裕）党重要人物，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要职。与李德裕、元稹被誉为三俊。长庆四年（824年），李党失势，李绅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马。放逐期间，李绅写了不少描绘路途艰险、发泄心中怨气的诗文。自宝历元年（825）至太和四年（830），李绅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处境有所改善。太和七年，李德裕为相，起用李绅任浙东观察使。开成元年（836年）任河南尹（管理东都洛阳的长官），旋又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毫汴颖观察使。开成三年八月，编《追昔游诗》3卷，并作序。诗序历述从少年起至入汴止的经历。开成五年任淮南节度使，后入京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继又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居相位4年。会昌四年（844年）因中风辞位。后又出任淮南节度使。会昌六年病逝扬州，终年74岁，归葬于故乡无锡。赠太尉，谥文肃。作品流传至今的有《追

昔游诗》3卷、《杂诗》1卷，收录于《全唐诗》。另有《莺莺歌》，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

《追昔游集》自序：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起梁汉，归谏垣，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越，历荆楚，涉湘沅，逾岭峤，抵荒陬，止高要，移九江，泛五湖，过钟陵，溯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阳，廉会稽，过梅里，遭谗者再为宾客分务，归东周，擢川守，镇大梁，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或显，不常其言，冀知音于异时而已！开成戊午岁秋八月。（原刻本《全唐文》卷六百九十四）

《旧唐书·李绅传》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本山东著姓。高祖敬玄，则天朝中书令，封赵国文宪公，自有传。祖守一，成都郫县令。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观察使李爱其才，辟为从事。绅以所为专恣，不受其书币，（锜）怒，将杀绅，遁而获免。诛，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遗。

岁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寻转右补阙。长庆元年三月，改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二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俄而稹作相，寻为李逢吉教人告稹阴事，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章事，以绅为御史中丞，冀离内职，易掎搥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知绅刚褊，必与韩愈忿争，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词不逊，大喧物论，由是两罢之。愈改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天子待绅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祸，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劳，赐之玉带。绅对中使位诉其事，言为逢吉所排，恋阙之情无已。及中谢日，面自陈诉，帝方省悟，乃改授户部侍郎。

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昼夜计划。会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及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与耆求荐，书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尝所密话言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间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缙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邓州司仓刘栖楚者，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而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之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

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欲拔木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而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贬制既行，百僚中书贺宰相，唯右拾遗吴思不贺。逢吉怒，改为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绅之贬也，正人腹诽，无敢有言，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语在《处厚传》。天子亦稍开悟。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篋。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及宝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书节文，不欲绅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左降官与量移。韦处厚复上疏论之，语在《处厚传》。帝特追赦书，添节文云“左降官与量移”。绅方移为江州长史。再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检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九年，李训用事，李宗闵复相，与李训、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郑覃辅政，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六月，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毫汴颖观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诏书褒美。又于州置利润楼店。四年，就加检校兵部尚书。武宗即位，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知淮南节度大使事。会昌元年，入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书侍郎，累迁守右仆射、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二千户。四年，暴中风恙，足缓不任朝谒，拜章求罢。十一月，守仆射、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六年，卒。

绅始以文艺节操进用，受顾禁中。后为朋党所挤，滨于祸患。赖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终。歿后，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归洛阳，而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陶左换乡）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初，会昌五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复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罢相，群怨方构，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卷一七三）

《唐才子传·李绅传》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黄榜进士，与皇甫（？是）同年，补国子助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武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特有名，号短李。与李德裕、元稹同时称三俊。集名《追昔游》，多纪行之作。又批答一卷，皆传。初为寿州刺史，有秀才郁浑，年甫弱冠。应百篇科。绅命题

试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传。（元·辛文房）

三首悯农诗：唐朝时候，亳州出了一名大诗人，名叫李绅。李绅自幼好学，二十岁中了进士，皇帝见他学识渊博，才学出众，招官翰林学士。有一年夏天，李绅回故乡亳州探亲访友。恰遇浙东节度使李逢吉回朝奏事，路经亳州，二人是同榜进士，又是文朋诗友，久别重逢，自然要盘桓一日。这天，李绅和李逢吉携手登上城东观稼台。二人遥望远方，心潮起伏。李逢吉感慨之余，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迁任如登台。意思是，如果升官能象登台这样快就好了。李绅此时却被另一种景象感动了。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在火热的阳光下锄地，不禁感慨，随口吟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听了，连说：“好，好！这首作得太好了！一粥一饭得来都不易呀！”

李绅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吟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逢吉一听，天呀，这不是在揭朝廷的短吗？这小子好大胆，回到书房，李逢吉对李绅说：“老兄能否将刚才吟的两首诗抄下来赠我，也不枉我二人同游一场。”李绅沉吟一下说：“小诗不过三四十个字，为兄听过，自然记得，何必抄录？若一定落笔，不如另写一首相赠。”李逢吉只得说：“也好，也好。”于是，李绅又提笔写下一首：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织梭女，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写好，递与李逢吉斧正。李逢吉看了，觉得这首诗在指责朝廷方面，比上两首更为具体。第二天，李逢吉便辞别李绅，离毫进京了。李逢吉表面上对李绅很好，可内心里却想拿他作垫脚石，再高升一级。他回到朝中，立即向皇上进谗说：“启禀万岁，今有翰林院学士李绅，写反诗发泄私愤。”武宗皇帝大吃一惊，忙问：“何以见得？”李逢吉连忙将李绅诗奉上。武宗皇帝召李绅上金殿，拿出那首诗来，李绅看看，说道：“这是微臣回乡后，看到民生疾苦，即情写下的，望陛下体察！”武宗说：“久居高堂，忘却民情，朕之过也，亏卿提醒。今朕封你尚书右仆射，以便共商朝事，治国安民。”李绅叩头道：“谢皇上！”武宗又道：“此事多亏李逢吉举荐。”李绅则对李逢吉感激不尽。而李逢吉呢，听说李绅反而升了官，又惊又怕，正胆颤心惊，李绅却登门向他表示谢意。李逢吉更是蒙在鼓里，只好哼之哈之。不久，李逢吉被调任为云南观察使，降了官。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李绅的三首悯农诗，千百年来人们只见到前两首。这第三首《悯农诗》被传到皇宫，后来哪里去了呢？只到近代，人们才在敦煌石窟中的唐人诗卷中发现。

李绅为人刚直，当谏官时得罪过一个显官李逢吉。李逢吉趁敬宗刚登基，就参了李绅一本，敬宗就找个借口把李绅贬为瑞州司马。李绅被贬，一路上翻山越岭到了康州。康州到

瑞州没有旱路，只有一条水路——康河，而康河水浅难以行舟。地方官说：“李司马有所不知。这康河有条老雌龙，这河水涨不涨，全看它高兴不高兴。康州人凡有急事上端州，都备下三牲礼品，上媪龙祠去求水，只要老龙高兴，马上河水就涨。李司马，你不如备上礼品，上媪龙祠祷求一番，试试如何。”李绅说：“礼品还分多寡么？”“礼品多，水涨得就大就快，礼品少了，恐怕就只好讲了。”

李绅勃然大怒，说道：“世上贪官污吏勒索百姓，犹令人愤恨，没想到龙为一方之神，竟也如贪官恶吏一般，可愤可恼，我偏不上贡，还要作文骂它一顿！”

地方官连忙说：“司马千万不可莽撞！惹恼了老龙，恐怕要误大人行期……”

李绅说：“当今天子恼我，尚不过把我贬到端州，水中一鳞虫，看它能奈我何？”来到媪龙祠，李绅命书僮摆出文房四宝，研好墨，伸好纸，手指着老龙塑像，写道：“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龙母，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写好，在老龙面前点火焚了，一道清烟升起。地方官吓坏了：“李司马，可闯大祸了！这老龙十分灵验，你这檄文一下，恐三月也涨不了水啦！”李绅傲然一笑，说：“误了行期，大不了丢了这顶乌纱帽。要是惹恼了我，拼着一死，我也要毁了这老龙祠，教世人不信这等恶神！”话没落音，家人禀道：“老爷，河水涨了！河水涨了！”

果然，汹涌大水从媪龙祠后滚滚而出，片刻之间，康河成了十几丈宽，深不见底的大河。地方官又惊又喜，喃喃说道：“难道老龙也怕李司马的檄文么？”

据史书记载，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并且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全然没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简朴与珍惜的意识。与李绅同一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费思量，颇让人费思量——一个对农民生产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感同身受，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怎么又一盘耗鸡三百只？这不是“吃农”、“啃农”么？前后判若两人呀！

李如祥

李如祥，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无锡县石塘湾梅泾人。少时爱唱戏曲和爱练拳术。16岁时撑货船往返于锡沪之间，在上海码头卸货完毕，即去看滩簧。18岁时拜常州艺人周甫艺为师，专攻小生。民国16年（1927年）在上海品芳剧场登台演出，饰演《珍珠塔》中方卿一角。

民国19年又在“无锡第一台”登台演出。拿手戏有《三笑姻缘》、《玉蜻蜓》、《双珠凤》等。当时被观众誉为“风雅小生大王”。与金德祥、周葆翔、杨云祥并称“四大祥”。走红时，

日唱常州，夜唱无锡，誉满沪、锡、常。民国 20 年，在无锡中央戏院演出《珍珠塔》“跌雪”一场，他从生活实际出发，借用拳术中的优美动作，创造了“四个跟斗不同样”的表演技巧，将方卿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艺术地表现出来。化妆也与众不同。方卿末中状元时，帽檐压近眉毛，脸上只擦白铅粉，连嘴唇也是白的；方卿中了状元，做了巡按出京，才两颊绯红，开始点唇。且表演细腻生动，故有“活方卿”之称。解放后，李如祥曾担任无锡艺术学校教师。1962 年，江苏省文化局在南京举行江苏锡剧流派会演时，他再次演出方卿“跌雪”一场。其唱腔优美动听，王彬彬始创的“彬彬腔”亦吸收了其中的优点。李如祥于 1968 年逝世，终年 60 岁。

李伯敏

李伯敏，又名李祯祥，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 年），无锡县玉祁李家巷人。民国 13 年（1924 年）夏毕业于无锡县第五高等小学，即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分校（今江苏省洛社师范）。后因家贫辍学，进上海立基洋行当抄写员。民国 18 年起，在丹阳童家桥小学、无锡东北塘茅梓桥小学、北门外蔡氏小学任教。曾与杭苇、陆静山等编辑、发行《小宝宝》、《儿童新闻》（周报），撰写时事评论、地理简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积极参加无锡小学教师为反对扣薪、要求改善待遇的请愿斗争。

民国 24 年夏，和钱秋苇等进步教师发起组织无锡抗日缉私同盟。一二九运动后，发动各界群众往无锡火车站慰问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民国 25 年 3 月，和陆静山、周秋野等发起组织无锡新文化研究会，6 月又成立无锡世界语协会。8 月 23 日，与陈佩三、张锡昌、钱秋苇、周秋野等发起组织的无锡学社成立。李伯敏担任学社理事会主席。

学社成立后举办形势报告会，组织宣传队，在《人报》副刊开辟“时事认识”专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1 月 1 日又组织无锡各界群众 500 余人，在锡师附小召开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无锡学社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无锡当局的注意。民国 26 年 1 月 28 日，李伯敏等被逮捕，2 月间移押镇江。他们坚持认为爱国无罪，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李伯敏于 6 月释放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赴沪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举办的救亡干事训练班。7 月下旬返锡，参与组织无锡各界青年抗敌后援会，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宣传、募捐、救护等工作。

民国 26 年 11 月下旬，李伯敏担任无锡青年抗敌流亡服务团第 2 队队长，率队到达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民国 27 年初，他参加新四军政训班学习，后派至九江地区工作。同年三四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江西青年服务团战地工作队第 2 队党支部书记。民国 28 年初，中共江西新干县成立前方委员会。李伯敏任书记，领导新干、丰城等 7 县的抗日救

亡运动。同年夏化名李白文，在浙江云和县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二保育院教导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民国 30 年二三月间，李伯敏被江西宪警逮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民国 31 年 6 月，集中营转移至福建建阳。

李伯敏患痢疾，得不到医治，于九十月间病逝，时年 33 岁。

李金镛

李金镛，1835 年—1890 年，江苏无锡人。少时务农，不久赴沪经商，他将经商所得常用于救灾及家乡公益事业。1876 年~1879 年，他因多次倡导义捐赈灾，安抚各地灾民，被提升为知府。1882 年，吉林将军铭安很赏识他的才华，向上奏请，留他在吉林府任事，并让他担任了第一任知府，1883 年，李金镛代理长春厅通判。1887 年，由李鸿章推荐，李金镛从吉林被调往黑龙江筹建漠河金矿，从此，他把毕生的心血全部献给了这片“北极之地”，后人称他为“黄金之路辟路人”。

1882 年，吉林将军铭安很赏识他的才华，向上奏请，留他在吉林府任事，并让他担任了第一任知府，派他前往图们江口勘定界址。他迫令俄方退还占地，重立了界碑。1883 年，李金镛代理长春厅通判，在他上任的三年中，长春厅得以大安，因他广施德政，很合民意。

1887 年，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金镛从吉林被调往黑龙江筹建漠河金矿。他积极奔走于天津、上海、烟台等地，募集资金，招聘矿师，购买机器，筹运粮食、军火、招募矿丁，于 1888 年 10 月抵达漠河创办漠河金矿，矿务局正式成立。设了三个金厂：漠河金厂、奇乾河金厂、洛古河金厂。

李金镛精心创业，整顿矿务，悉心处理与俄方的交涉事宜，收复了被俄方占据的金矿，在小北沟加强操练军队。俄方见李金镛勇而多谋，颇惧李金镛的威势。自此各遵奉条约，两境相安无事。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豪爽正直、富有民族气节的传奇人物。

1890 年 9 月 14 日李金镛终因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在漠河金矿与世长辞。临终之际他的家人和僚友们守在身边，李金镛挣扎着坐起，说：“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什么遗憾的。我所抱憾的是金矿刚见成效，苍天不给我年华，使我不能见到三年后的盛况。望诸君好自为之！”说完，吐血数升气绝。临咽最后一口气，也没论及半句自己的私事。僚友们无不伤感流泪。把头、矿工等闻讯也都赶来哭祭，皆泣不成声。德在人心，功在边陲。

由于李金镛所创办的漠河金矿达到了清政府的办矿宗旨——兴利实边，因此李鸿章请旨加封李金镛。清廷颁旨，让李金镛的事迹在国史馆立传，荫袭一子（入监读书），并准予在漠河及原籍无锡建立祠堂以示恩宠。

直到现在，采金人在掘碇前（即挖矿井）都首先要顶拜李金镛的亡灵。用一根木棍系一块红布，当成李金镛的偶像，以表示对他的敬服。

1887年4月，李金镛率人沿着鄂伦春人狩猎的羊肠小道，亲访实察达5个月之久。他给上司所打的报告，勾勒出了漠河的自然状况：“地邻北极，严冬则雪高盈丈，马死人僵；夏秋多虫，塞耳盈鼻，起居服食，无一不难，无一不苦……”此非危言耸听。然而，李金镛并未气馁，他直接求见李鸿章，详禀漠河金矿开办细情，得到李鸿章的赞许，随即便到烟台、平度、上海等地筹集商股，购买机器。

1888年10月，李金镛又率清政府调拨来的500士兵，跋山涉水，沿着上次历经艰险而开辟出的直达漠河的“黄金之路”，来到了北极苦寒之地漠河。正式成立了漠河矿务局，并于1889年1月开工生产。

李金镛是以“核算明确”而闻名的官员，他将长期从事行政事务而积累起来的经验，运用到开办金矿上来。在开办之初，他就亲手制定了非常严密的十六条章程。其中：“司帐宜公举”、“股友宜助理”、“局且宜节省”、“盈亏宜预计”、“余利宜分派”，在经济上有效地保证了金矿的运转，特别是“股本宜招集”的举措，这在当时清政府资金困窘的情况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李金镛虽然身处边塞开矿，但目光还是很广阔的，他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开办金矿这一新鲜事务。李金镛明确提出：“矿师宜妥延也。既用机器，即不能无矿师。”“本公司事事核实，兼之僻在荒漠，须耐艰苦，宜择用西国矿师之肯耐劳耐烦者，自总办以下只能与厂中司事同其隆杀，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这种对洋人不卑不亢，奖赏分明的态度至今对我们创办外向型企业仍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早在制定章程前李金镛就从引进外国技术、机器等实践中得出了不能盲目迷信，坚持以我为主的认识。1888年10月，当上司让李金镛等美国矿师共同勘察金矿时，李金镛当即答道：“西洋矿师大半有名无实，冒昧延订，徒滋糜费”。在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时，他强调必须请有真才实学的，否则立即辞退。如从热河聘哲尔矿师，从平度聘阿鲁士威矿师，“延订合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不拘年限，即行辞换”。假若洋人确有可学之处，李金镛则虚心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如1890年夏天出金不甚起色时，李听说俄金厂所制淘金木机器甚为得手，即亲赴漠河左近俄乌交斯金厂参观考察，并雇佣俄匠来漠河仿造。新仿木机器投入生产后，效果很好。

李金镛在勘察和创办漠河金矿的实践过程中，感受到了交通运输不便，势必制约矿山的发展，所以，他积极向清政府建议：漠河金矿要自备轮船，陆路也要开通，“即不开矿，亦是边防要图”。李金镛将这两条还写入办矿章程之中，应该说，这一见解不愧为远见卓识。后来漠河金矿的衰落，交通不便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长于治业的李金镛，很懂得一个企业的成功，必须要有一大批能干的工人。所以李金镛规定了工人得六、厂局得四的“分成制”，实行计量工资制度，多采多奖，而且“在厂之人

自总办及员司夫役等皆得均沾酌赏，计人计工，不得使有一人向隅”。这些措施，调动了金矿工人、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加之李金镛规定采金工人发财后可回乡探亲，于是，漠河金矿的名字迅速传遍了东北、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地，许多人都奔向漠河，金矿一时激增到万余人。漠河金矿规模也增大，除漠河外，还包括观音山、奇乾河、呼玛尔河等，这是中国近代黄金开采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漠河金矿开办的当年，即 1889 年（光绪十五年）漠河金矿就向清政府上缴 3 万两黄金。到了第二年 1890 年（光绪十六年）漠河金矿所产黄金竟达 62000 两。不仅还清了公私股金，提存了余利，还解充黑龙江的军饷。慈禧太后的奢侈是举世闻名的。据传，她曾十分惊讶漠河金矿给她贡献大量黄金，漠河产金的老沟之所以还有一“胭脂沟”别名，就是因为它所产的黄金满足了慈禧所需要的耗费巨大的胭脂钱。

漠河金矿办得十分成功，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为当时的官办近代企业树立了一个范例，这是和李金镛的全身心投入分不开的。笔者曾在上海访问过李金镛之孙李禹言、重孙李鸿猷，他们满怀感慨说起李金镛到漠河开办金矿时的艰辛情况，其中说到李金镛初到漠河时，由于日夜想的都是如何把金矿开出来，竟没有几天头发全白了！于此可见李金镛一往无前的精神。

正因如此，李金镛周围才能聚集起一批有志之士，如宋小濂所说：“李公之来漠河也，多士景从，人才济济”。这些人几乎都是和李金镛一样全来自富庶鱼米之乡的南方人，如浙江海宁的钟勉孚、湖北的刘建生等，他们来到荒凉的漠河协助李金镛。为活跃新创金矿企业文化气氛，他们还组织起了“塞鸿诗社”，拈题分韵，佳句不绝。

李金镛在开办金矿同时，还在荒芜土地上辟地种菜，不仅改善了食品供应，而且美化了环境，使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了乐趣和信心。后代学者都认为，漠河金矿“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金属矿中经营最成功的一个企业”。漠河金矿无疑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李金镛于 1890 年殉职于漠河，可漠河金矿的规模已定，袁行南、希述之、胜寿卿、多荣封诸人继任，金矿生产并未因李金镛故去而受影响，利润仍逐年增加。

李金镛去世后，以一金矿督办职务入国史馆立传，并被追赠为内阁学士（二品官）。这种特殊的荣耀，反映了清政府对李金镛办理漠河矿务功绩的重视。

李金镛成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脊梁一类的人物。笔者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查阅馆藏资料——民国 7 年 10 月《漠河金矿沿革纪略》时，发现此金矿从开办的设想、计划、筹款，到组织实施，一直是在李鸿章亲自关注下进行的，这反映了李鸿章对创办漠河金矿的重视，体现了当时朝野人士兴办实业，“求富以达强”的构想。而李金镛则是在这大历史背景下身体力行最杰出者。李金镛同时代人为他所送的挽联上所说的：“启国家开矿之任，安边兴利，默运精心，功业迈古今”，他是当之无愧的。

李嘉谋

李嘉谋，民国 5 年（1916 年）8 月 2 日生，无锡县玉祁镇人。8 岁丧父，全家靠母亲种桑养蚕过活。在玉祁中学读完初中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民国 23 年夏，经人介绍到上海机器厂当管帐，后因病回家。翌年经邻居郑翔德介绍，入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当练习生，学习机械制造。

日军侵占无锡前夕，避难到重庆，在郑翔德开设的同心酿造厂工作。后又转到复兴铁工厂当技术员，担任出口印度纺纱机的设计。民国 32 年任建新机械厂工场主任。后又回到同心酿造厂当工务员。民国 36 年春，从重庆回到无锡，进无锡庆丰纺织厂任纺部清棉车间领班。

解放后，李嘉谋在庆丰纺织厂（后改国棉二厂）担任纺部保全科长、纺部调查统计室与机械保全部副主任、科研室主任、机电车间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专职工程师等职。1954 年任纺一前纺车间副主任期间，为节省用棉，与技术员、工人一起设计制造纤维杂质分离机，解决下脚棉回用含杂多的关键问题，直接降低原棉消耗，每年可节省棉花 48 万斤，折合人民币 8 万余元。第二年纺织工业部授予红旗，以资奖励。他也多次被评为江苏省和无锡市劳动模范。在以后的技术改造中，他又与工人一起，把复式清棉机改为单程清棉机，提高了棉卷质量，缩短了工艺流程。

在机械保全工作中，他改进梳棉机曲轨和盖板头检修等十几项检修技术，提高了机械设备的生产效能和设备利用率。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和 1959 年，两次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1974 年因患癌症病逝，终年 58 岁。

朱士嘉

朱士嘉，字蓉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无锡县东北塘乡塘头镇樊七桥朱巷。他 15 岁那中父亲去世，家庭经济陷于困境，无力继续升学。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进江阴阴实中学读书。他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了 2900 多部地方志，这堪称是《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姐妹作。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国内学者不了解其底蕴，朱士嘉著作的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24 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在该校参加了禹贡学会，开始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地方志研究的文章。大学毕业后，考取同校硕士研究生，于 1932 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兼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同时，“与燕京大学研究生谭其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现璠等及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邀请顾（颉刚）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黄现璠、朱士嘉为记录。顾先

生到得很早，讲许多嘉言励语。”这时他又参加了地理学会，常在《地学》上发表文章。他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广泛涉猎全国各地方志，积累资料，着手编辑《中国地方志综录》。该书于1935年出版，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具书，实用价值极高，引起了国内史地学界的重视，也引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注意。该馆东方部主任于1939年邀请他赴美。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3年内遍览馆内东方部特藏之一的中国地方志。

在这期间，他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展览会，发现该馆藏有大量有关华工的档案。3年内，他利用业余时间，复制了大约1000多页有关中美关系的档案胶卷。这是研究近代中美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后来他全部携带回国，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1942年9月，朱士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在由他任主编的该校中国留学生刊物《新潮》上，大量报道了美国档案馆所藏中美档案的情况。这时正值国内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治上腐败无能，朱士嘉利用这一刊物也作了大量报道，帮助海外留学生了解国内政治情况。

1946年7月至12月，朱士嘉进美国档案馆学习档案管理法。这时他已获博士学位。他在学习其间，仍注意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摸集，同时搜集“美档”所藏有关欧洲各国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他在这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回国后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翌年，他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系之聘，任该校副教授。在研究生的帮助下，又搜集、整理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300多卷。这时，他参加了美国远东学会、美国地方志学会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1948年，他积多年研究心得而撰写的论文：《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在远东学会年会上宣读，颇得好评，与会者一致认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文后来发表在《美国远东季刊》上。1950年春天，他在西雅图结识了国际著名记者路易·斯特朗，他从路易·斯特朗那边了解到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又在路易·斯特朗的热情鼓励下，在周鲸生、陈翰笙等著名学者的召唤下，毅然决然辞去了华盛顿大学的优厚职位，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年他刚45岁，精力充沛，学有成就，是人生的最佳时期。

1950年9月，朱士嘉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当时出任该校党委书记的是一位为鲁迅在一封公开信里痛加批评的人，对知识分子执行“左”的政策，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档案学和方志的建设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朱士嘉的专长自然难有机会发挥。3年后，他在李达校长的支持下，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这期间，他虽参与编写历史资料的工作，但以他的专长来衡量，似乎并不相称。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他未能免于劫难，被抛出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道，只能在图书馆中从事一般技术性的工作。从1958年到1960年之间，换了3个地方。但即使在逆境之中，他也没有放弃本职工作，一面修订《中国地方志综录》，一面校补张国淦遗稿《中国方志考》。为此他自费赴

南北各地调查，获得很多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上，革新体例，充实内容，编写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了 8000 多部地方志。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理组利用它在各地图书馆找到了大量天文资料，编写成《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两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朱士嘉已年届古稀。但新的历史时代，为他迎来了“晚晴”的暮年，使他得以如刘禹锡所说的“将有为补跟蹉跎”。他的专长有了“用武之地”。1980 年 4 月 8 日，胡乔本在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国家有个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1981 年 7 月 25 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正式成立。在这次大会上，各省市代表一致要求，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1983 年 9 月 9 日，经批准同意恢复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朱士嘉，被推为协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指导小组成员。自此以后，全国有 17 个省和自治区，84 个城市和 1070 个县，先后建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参与修志工作的人，组成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出现了“盛世修志”的空前盛况，朱士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这一工作。他一方面看到一支庞大的修志队伍都是新手，需要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素养；另一方面也看到社会主义时代编修地方志，无论是观点和方法，还是体例结构等，都不能照抄旧的地方志，必需予以革新，但也不能割断传统；因此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和旧方志的关系，必然是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他针对这一类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整理研究地方志刍议》、《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浅说》，《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等，都是属于普及地方志知识的重要文章，对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指明了方志在历史文献中的价值和作用，也指出了方志在反映社会制度、礼俗习常、民生利弊，有它为五史所不能及的优势。方志在这些方面，委曲隐微，莫不具载。另外，《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编修地方志的经验之作。行文条例清晰，议论精辟。对于历史上有关地方志性质的争论，有他自己的见解，在地方志学史上应有他的地位。

朱秀谷

朱秀谷，又名逸民，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无锡县八士东房桥人。童年入私塾读书，父母双亡后辍学，便去无锡南门一家布店当学徒。

后在东房桥开小酒铺。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毅然弃业走上革命道路。民国 13 年（1924 年）春，与进步青年过望春等在自家清燕堂成立青年会，宣传新三民主义。

民国 15 年 9 月，江苏省农运特派员安友石与朱秀谷取得联系，授以任务。朱秀谷以青年会成员为骨干，号召和组织农民建立乡、镇农民协会。

民国 16 年初成立天下市农民协会，他被选为协会主任。同时，经安友石介绍加入中国